

兒童如何變成了歷史的主題：

論民國時期發展話語的建構

安德魯·瓊斯^{*} 著

王敦、鄭怡人^{**} 合譯

摘 要

此文辨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民國時期的文學和文化裡面關於兒童的修辭和話語建構。從1917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開始的這段時間，見證了有關兒童、童年和兒童發展的話語爆發，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中有待充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兒童，被修辭化為譜寫國族歷史新篇章的象徵。民國時期對兒童的發現，體現為在認識論、意識形態、教育制度，甚至商業上的多重疊加。周作人對「兒童文學」的呼求，游移在認知發展、童年本位和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之間。魯迅在《狂人日記》裡將「救救孩子」的訴求嵌套於宣告狂人已經「早愈」的古文序言中。此文指出，如此種種努力，遭遇了發展主

* 作者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講座教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譯者王敦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鄭怡人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研究生。

義話語邏輯裡面的內在敘事悖論，而陷入困境。

關鍵字：兒童文學、發展主義、魯迅、周作人、進化論思想、《狂人日記》

The Child as History in Republic China

Andrew F. Jones

Translated by Wang Dun, Zheng Yi-ren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figure of the chil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its charged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 to the vernacularization of 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dven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1917 and the outbreak of full-scale war with Japan in 1937 w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interest in and explosion of discourse for and about children, childhood, and child development. Figured as an emblem of the unfolding of national history, the child was singled out as an object of intense interest and intervention on the part of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s. And yet, as shown in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Zhou Zuoren's advocac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u Xun's canonical calls to "Save the children!" in his "Diary of the Madman," these efforts often foundered upon the internal narrative contradictions of developmentalist logic.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developmentalism, Lu Xun, Zhou Zuoren, evolutionary thought, *The Diary of a Madman*

兒童如何變成了歷史的主題：

論民國時期發展話語的建構^{*}

安德魯·瓊斯 著

王 敦、鄭 怡 人 合譯

^{*} 譯者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教授於2011年出版了專著《發展的童話：進化論與現代中國》（*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對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問題予以新的處理，對潛移默化的「發展」思路作了譜系學探索。作者考察了本土知識分子如何建構了從生物到人類、從童年到成人、從野蠻到文明、從個體到民族國家的一組組具有相同結構的發展主義式框架，認為這一套「落地知識」（vernacular knowledge）框架，在改變歷史、國家、世界想像和敘事的時候，也設下了牢籠；知識菁英一邊參與這個建構過程，一邊敏銳地看到了諸多陷阱，將求索和焦慮表述為悖論式隱喻，穿透歷史，直達今天。此書獲得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第43屆 James Russell Lowell Prize 榮譽提名。幾十年來，鮮有從事漢學研究的專著入圍此獎。書名《發展的童話：進化論與現代中國》裡面有一個關鍵字：「童話」。作為文類的童話和作為話語對象的兒童，在書中都得到集中闡述。安德魯·瓊斯開拓了有關兒童的話語建構和以科學面孔出現的進化論話語之間的複雜關係。這裡譯出的，即是該書的第三章〈兒童之於民國歷史：建構發展話語〉。在這一部分，瓊斯教授揭示了周作人深受十九世紀英國民俗、神話學者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進化論式兒童文學觀的影響。瓊斯也通過對二〇年代心理學家黃翼（1903-1944）的《兒童繪畫之心理》的分析，展示彼時中國的兒童話語的底色，是基於西方所總結的人類普遍「發展歷程」。此發展主義式兒童觀的思維窠臼，是在歐美現代人和野蠻人之間、成年人與兒童之間的雙重二元對立；最終的價值主體，是將歐美文明和成年人合二為一的歐美成年人。這一西方的「發現兒童」話語，並不能照搬來解答如何來發現「中國的兒童」的問題。

一、關於發展的話語

歷史隨處皆可觸摸，這從1938年商務印書館一本名為《兒童繪畫之心理》的書中即可得之。我們今天能從此書中所觸摸到的，是民國時期致力於將現代科學知識本土化的中國學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處的知識困境。書的作者黃翼（1903-1944），是兒童心理學在中國的開創者。¹ 該書基於歐美的研究成果，描述並分析兒童繪畫特徵及心理原理。黃翼通過收集和分析中國兒童的畫兒，宣稱說：「在歐美文化系統以外，我國兒童，發展的歷程，也是一樣，毫無疑義。」² 也就是說，黃翼的研究，是用本土例子來確認國外認知發展理論的普遍性。

從那時候到現在，歷史的篇章又翻過去很多頁了。回過頭來看，該書的亮點不在於作者所宣稱的西方普遍理論之有效性，反而是那些中國兒童畫本身具有的日常歷史性。它們是浙江大學教育系在1936年冬季，從杭州橫河小學收集的。這些兒童畫如同一道畫廊，向我們呈現了具體而微的民國時期物質文化風景（旗子、時尚、傢具、家居），以及社會各色人等（學童、工人、商人、主婦、運動員、舞者、國軍士兵）。

我特別關注了兩幅兒童畫。它們如同通向歷史的視窗，勾勒出了半殖民地社會的痼疾。第一幅畫描繪了我們可以稱之為「現代女孩」的形象。透過這一形象，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間，現代都市的種種愉悅（新形式的休閒、自由性愛、女性獲得的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和經濟上的機會）與陷阱（人際關係商品化、賣淫，以及對女工的剝削），都躍然紙上（見圖一）。第二幅畫畫了一個「苦力」。這種流動勞工，逃離了鄉村中的經濟衝擊和自然災害，在當時殖民主義之下的

¹ 黃翼：《兒童繪畫之心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黃翼曾求學於清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其後於耶魯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他1930年回到中國，在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任教。參見黃翼：《兒童心理學》（臺北：中正書局，1952年）。

² 黃翼：《兒童繪畫之心理》，頁104。

通商口岸隨處可見。(見圖二)



圖一：由一位七歲女孩所畫。摘自黃翼《兒童繪畫之心理》第22頁原圖1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鳴謝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東亞圖書館。



圖二：出自一位十一歲女孩之手。見黃翼原書第29頁原圖26。鳴謝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東亞圖書館。

不過，對黃翼而言，這些繪畫不是用來觀察社會的視窗，而是他用來展示兒童認知普遍「發展歷程」的中國標本。他告訴我們，這一歷程分為遞進的四階段：依次為「塗鴉期」、「象徵期」、「定型期」和「寫實期」。³ 在黃翼的眼裡，畫幅中那身著時髦旗袍、特徵清晰的現代女性形象，證明小畫家成功地具備了相應的寫實能力。反過來，另一幅畫裡苦力手臂的過長，則被解釋為另一位小畫家的力不從心。⁴

總之，黃翼所著眼的不是繪畫所表達的內容和感染力。然而在今天，正是他所忽視的東西才最能勾起我們的興趣。那位現代女性獨自徘徊在道路中央。她的髮式和著裝將她置於許多可能的社會角色之中：妓女、舞女、情婦、職場女性。她的旗袍上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子以及精緻的蝴蝶扣包邊，精確地指向1935年夏季中國女性時裝的前沿。而那苦力的扁擔、圓帽和不成樣子的衣服，則顯得與上海和杭州這樣現代城市的商業節奏很不協調。他顯然不是能夠供自己的孩子到橫河小學這樣的學校讀書的那類人。

在我看來，這兩幅畫裡面鮮活的社會歷史意義，分明已經「溢出」了黃翼的兒童認知心理學框架之外。畫中那位女性的直直方方的旗袍，是否意味著女性的身體被囚禁在「現代」的性別商品包裝之中。我們能否將那苦力出奇地伸長了的手臂，讀作他與他的勞動之間的異化？從他那歪歪扭扭的牙齒和他肆無忌憚的注視之中，能否看出苦悶和絕望？

在觸摸現代中國文化史的時候，我們該如何去看待這類溢出的資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歷史哲學論綱》（1940）一文中寫道：「歷史地描繪過去，並不意味著『按它本來的

³ 幾乎可以肯定，黃翼那時借鑑了 James Sully 頗具影響力的《童年研究》一書。該書將「萌芽時期的藝術」兒童繪畫比作「現代野蠻人」的作品，並細緻地設計了培養「年輕的畫手」，逐漸發展出高度現實主義技法的過程。參見 Sully, *Studies of Childhoo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331-398.

⁴ Sully, *Studies of Childhood*, 27, 99-100.

樣子』去認識它」。相反，「歷史被分解成圖像，而非故事；只有當過去像一張圖片一樣，閃現於某一個能夠看到它的瞬間，它才能被把握。」⁵ 捕捉這樣的圖片，就是將歷史從發展敘事的給定臺詞中解救出來。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⁶ 當把這些圖片放在如同琥珀一般包裹著它們的歷史上下文裡面來讀時，它們就栩栩如生了。

從1917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的這段時期，見證了有關兒童、童年和兒童發展的話語爆發，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中有待充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既包括新學科（如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的建立，也包括面向廣大讀者的話語傳播普及。黃翼的研究和出版僅為一例。

正如魯迅（1881-1936）在《孤獨者》裡所關注的，對兒童的發現和思考，也滲入了這一時期的文化批評和文學話語之中。對童謠的收集，曾經在發展本土新白話文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⁷ 在翻譯、創作方面，民國時期文壇中的許多主要人物——除了魯迅和周作人，還有茅盾（1896-1981）、葉紹鈞（1894-1988）（葉聖陶）、張天翼（1906-1985）、冰心（1900-1999）、趙元任（1892-1982）和豐子愷（1898-1975）等——都躋身到為兒童創作的行列中。無論是將像《格林童話全集》（趙景深譯，1932-1934年）和《愛麗絲夢遊奇境記》（趙元任譯，1922年）這樣的歐洲經典譯為中文，還是為中國兒童創作新的文學和音樂——如葉紹鈞的童話集《稻草人》和黎錦暉（1891-1967）創作的兒童歌舞劇，不少大師都極為用心。無處不在的兒童形象，也進入了大眾文化。彼時出現了《兒童世界》和《小朋友》

⁵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55. 也參見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220.

⁶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220.

⁷ Chang-tai Hung (洪長泰),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107-134.

等品牌雜誌，還有漫畫（比如豐子愷關於兒童的奇思妙想之作和張樂平（1910-1992）在多家報刊上刊登的《三毛流浪記》），和兒童電影明星（如胡蓉蓉，她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被譽為中國的「秀蘭·鄧波兒」）。⁸ 這次話語爆發，開啟了一個致力於教育、表現兒童並從兒童身上獲利的新市場。中國的「啟蒙的生意」，落在了教科書和其他面向學校、父母和兒童的教育性讀物的銷售身上。這樣一個市場，對那些與新文學及其國家建設的宏願聯繫最為密切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舉足輕重。⁹ 無論對於現代世界知識的本土化，還是對白話小說的興起而言，對兒童的發現，都儼然在經濟消費、知識話語和意識形態上不可或缺，並深刻地引導了這一時期的大眾傳媒。

將上述這些貌似不相干的領域在兒童問題上交叉起來的，則是暗地裡貫穿了民國和1949年之後意識形態的發展主義思維。「發展」一詞橫跨國家建設、政治經濟、教育學和文學史諸領域。這些語義的歷史交叉，絕非偶然，更在今日中國的後社會主義市場化和全球化態勢中再次煥發出強大的活力。追溯當代發展主義的歷史源頭和譜系，就要回到民國時期將兒童發展看作是國家發展先決條件的表述原型。提出這一觀點，就引發了一個不容易用幾句話就能夠說明白的難題：成年人如何假借兒童之眼來表述歷史？

⁸ Ann Anagnost, "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Shuen-Fu Lin and Ernest P. Young, eds., *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201-212.

⁹ 「啟蒙的生意」這個說法，源自 Robert Darnton。參見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cyclopedi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李歐梵也運用了這個表達。參見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7。晚近對出版史的研究，參見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二、「救救孩子」

我們該如何解釋民國時期這一場關於兒童形象修辭的大規模話語投資？教育和出版如何扮演各自的角色？我認為，這些都離不開意識形態對文藝表述的形象性層面的經營。這在魯迅1918年劃時代的《狂人日記》中得到精微展現：讓兒童化身為國家救亡的主體，歷史從此將完美重生。但同時不應放過的是，魯迅也憑藉巧妙的嵌套敘事架構，徹底質疑了上述話語修辭。關於這一糾結的根子，又要回溯到十九世紀末，從頭談起。彼時，嚴復（1854-1921）將 T. H.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為文言文《天演論》，使得聞所未聞的社會進化論思維在中國知識界產生振聳發聵的效果。到了民國之時，這套話語已經深入到魯迅等知識分子的心中，顯得恰逢其時，越來越獲得迫切的應用，特別是在欲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新文化運動中。¹⁰

這個故事，已經從各種角度，以各種方式，被講述過很多遍了。我想突顯的是，操持這一雄心大業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把兒童連同教育問題，當作替國家除舊佈新的利器。發表於《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就是以此數為觀止地開闢了新文化運動。用文言文寫成的序言，告訴讀者該「日記」的來龍去脈。繼之而來的日記本文則是極其直率的第一人稱白話文。在被迫害妄想症諷喻寓言的外殼之下，它是對儒家教化的驚天反轉與清除。狂人對自身被裹挾入儒家文本秩序的境況發出了質疑：

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眾不同」。我

¹⁰ 關於達爾文學說在中國的傳播之研究，參見 James Reeve Pusey（浦嘉璿），*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那裡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吃的時候。¹¹

狂人抓住這些說教的似是而非，不遺餘力地瓦解之：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¹²

這一最初的揭示之後，便認定「合夥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狂人用了《左傳》中的「易子而食」、「食肉寢皮」等幾個吃人的「證據」：

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吃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糊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唇邊還抹著人油，而且心裡滿裝著吃人的意思。¹³

這一拋棄先前所學的顛覆性時刻，隨著諷刺的意味彈射而出。其寓意力量，基於狂人孩子氣地將儒家經典中的寓意修辭當作字面義。狂人對「吃人」的文本的拒絕態度，取決於魯迅自身對儒家的「吃人」指控。這樣的啟蒙修辭呈現出無法持論的深刻悲觀：魯迅在開始講這個故事之前，就已經拋出了結局——在文言文序言裡我們得知，狂人「已早愈」並「赴某地候補矣」。這一現代主義式的嵌套結構，將讀者置於一個並無出口的敘事圈套。在叛逆姿態的背後，狂人明

¹¹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卷1，頁425。

¹² 魯迅：《魯迅全集》，頁425。

¹³ 魯迅：《魯迅全集》，頁427。

白：自己也不過是這一「吃人」的文化制度中的一員。

在發現大哥也合夥「吃人」不久後，他跑去向大哥提一個請求。這請求，正是用當時出版文化中流行的進化論本土口吻所表達的：

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¹⁴

與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假定的自然選擇的非能動性恰好相反，魯迅似乎在此暗示，人只要具備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意志，進步就是能夠實現的。不過，一個令人尤為煩憂的反題，在這一命題之上徘徊不去。狂人又意識到，在他不知曉的情況下，大哥已經悄悄把人肉（包括他死去的小妹妹）端上自家的餐桌了。就這樣，狂人自己，早已是他所憎惡的「吃人」傳統中的同夥了：「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當然，魯迅在此意指的，是文化遺傳的不可避免性。傳統教育的傳承將了教育逆轉的軍，勝過了想要改變的意志。〈狂人日記〉的結尾語，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經典中最為著名的句子之一：「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這一句話，往往被理解為對革命鬥爭的訴求。例如，1961年，蔣風（1926-）在一本有關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的著述中，就以一連串的讚美作為開頭：

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文化新軍最偉大最英勇的旗手」的魯迅先生，不僅是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人，而且也可說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奠基人。在他偉大的戰鬥的一生中，對兒

¹⁴ 魯迅：《魯迅全集》，頁430。

童文學曾作出巨大貢獻。……在那黑暗的反動統治年代裡……他把孩子們的命運和民族前途聯繫起來，因此，早在他寫《狂人日記》的時候，就已喊出「救救孩子」的呼聲。¹⁵

英語世界的學者對此表現了相似的態度。（儘管少了一些教條的痕跡。）夏志清（C. T. Hsia, 1921-2013）和威廉·賴爾（William Lyell, 1930-2005）討論了魯迅的「溫情主義」和「對青少年的理想化」。¹⁶ 瑪麗·法誇爾（Mary Ann Farquhar）在她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中，認為這是將兒童從「愚昧的束縛」中解救而出的「希望的吶喊」。¹⁷ 不過，這樣一來就意味著要撫平文本自身的「皺褶」，忽視作者刻意做出的敘事上的「表裡不一」。

然而，這篇故事的有趣和高明之處，恰恰就在於文本自身的皺褶。開頭的古文框架（通過讓讀者確信狂人已回歸「正常」；這一開頭同時也是後面白話文敘事性的結尾）將狂人抗爭的樂觀，徹徹底底地消解。狂人在整篇白話敘事裡面的心路歷程也將終結於此，含蓄表達出作者對於啟蒙使命本身的懷疑——已經具有「吃人」的污點的大人，如何拯救孩子呢？難道，對救救孩子所體現出來的修辭激情，不過是表達了大人針對自己罪孽的救贖欲望？抑或是打著「救救孩子」旗號的大人啟蒙者的自救式想像？或者更糟的是，他們是否不自覺地在轉換「吃」法，仍然是在打孩子的主意？

《狂人日記》敘事結構上的內在自我消解，很好地折射了啟蒙實

¹⁵ 蔣風：《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北京：少年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1。

¹⁶ 參見 William Lyell, *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305. 也參見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52-53. 夏志清看到了「暗藏的溫情主義」（“insidious sentimentality”）。引自 Mary Ann Farq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56.

¹⁷ Mary Ann Farq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56.

踐的社會困局。兩者的局面是同構的。爲了救出孩子，把他們放置於新的發展歷史軌道中去，需要從他們身上洗去所有的舊文化傳承嗎？革命式的教育干預是否合理合法？這是否意味著一邊把孩子從舊文化裡解救出來，一邊又把他們當成拉動國家新歷史的小馬駒？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許多作者都熱切地投入到關於這些問題的論爭之中。沈兼士主張「兒童公育」，建立「兒童研究機構」，讓兒童生理學和兒童心理學的專家負責養育。¹⁸ 兒童問題，似乎被看成能解決「被死死鏽在一起」的落後中國之諸多問題的救命稻草。¹⁹ 然而在魯迅的小說裡，「救救孩子」的決絕是嵌套於宣告狂人已經「早愈」的古文序言中，暗示了烏托邦藍圖只是一廂情願，與舊文化的決裂亦不可能。兒童，無法被當作一塊白板，讓大人在上面痛快地重寫國家歷史進程。在對兒童的生養過程中，文化早已銘刻。

三、對兒童的發現

通過改變中國的兒童來改變中國，這是發展主義歷史觀的顯現。民國時期對兒童的發現，體現爲在認識論、意識形態、教育制度，甚至商業上的多重疊加。「發現兒童」這個說法，借自法國學者菲力浦·阿雷茲（Philippe Ariès，1914-1984）於1960年出版的典範

¹⁸ 沈兼士：〈兒童公育〉，《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1日），頁635。參見許風霜：〈近代中國兒童公育思想的發展與影響〉，《幼稚教育》第8卷第7期（2007），頁90-93。其實早在一代人之前，康有爲已經在《大同書》中提出了雛形。

¹⁹ 沈兼士：〈兒童公育〉，頁636。同時期對女性問題的關注也是五四話語的熱點。參見 Tani Barlow（白露），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y Chow（周蕾），*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以及 Lydia Liu（劉禾），“The Female Body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Manchuria in Xiao Hong’s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in Angela Zito and T.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57-177.

著作《數世紀以來的童年：一部社會史》（*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²⁰ 阿雷茲注意到在中世紀時，兒童基本上被理解為「縮小的成年人」。他認為，童年作為一個被意識到的特定人生階段，並成為家庭結構和教育制度的關注焦點，是近現代社會發展的結果。十七、十八世紀時，學校和新興的核心家庭結構，意識到對兒童進行教育和規訓的重要。²¹ 資產階級家庭「脫離」了中世紀社會生活中的混雜狀態，變成十九世紀時相互獨立的內向式家庭。兒童成為了資產階級文化自身再生產所需的知識、想像、規訓和投資的對象。對兒童的發現，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現代歷史階段的一個標誌。²² 盧梭在《愛彌爾》中對兒童天性的浪漫主義式推崇，與這一時期寄宿學校的興起，並非巧合。而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期，盧梭的這本書又被恰逢其時地譯為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²³

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出現一本相當於阿雷茲的著作那樣，全面講述關於中國人之童年的文化史。而且，由於中國的現代歷史與西方十分不同，所以不能簡單地把阿雷茲的敘事套用到關於中國兒童的文化史上。²⁴ 近年來，很多的西方學者也講出了與阿雷茲不同的見解。²⁵ 儘管如此，《數世紀以來的童年：一部社會史》確實是一塊可

²⁰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²¹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10, 413.

²²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414-415.

²³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281。魯迅在1928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和胃口〉的文章。見魯迅：《魯迅全集》，卷3，頁559-563。

²⁴ 參見 Ping-Chen Hsiung (熊秉真),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亦參見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以及 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²⁵ 最為突出的，參見 Nicholas Orme (尼古拉斯·奧爾姆), *Medieval Childre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供參照的他山之石，用來為思量五四時期的兒童話語和中國現代文化發端提供參照。五四的兒童問題話語具備鮮明的現代民族主義特徵，並培育了針對兒童教育市場的資本運作。可以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兒童話題，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教育界和出版界謀得了生計——很多人離不開「吃」兒童這碗飯。於此同時，中產階級兒童也被塑造成了資產階級文化的潛在消費者。

周作人（1885-1967）影響深遠的〈兒童的文學〉（1920）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

以前的人對於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聖經賢傳」儘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麼，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²⁶

周作人的意思是：在弄清楚兒童期是怎麼回事之前，不要帶著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動機去塑造兒童。²⁷ 周作人特別反對那些出於為了塑造共和國未來主人翁意識的狂熱動機，而去讓兒童閱讀具有政治和道德說教意味的讀物。相反，他認為兒童應當閱讀與他們的心理發展水準相合的，想像奇特的童話。針對周作人這種看似無功利（且充滿人道主義精萃）的觀點的討論，成為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兒童文學的本質和作用的爭論的焦點。文化保守主義者認為，這樣的童話往好裡說是毫不必要，往壞裡講則是圖謀不軌，而左

²⁶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1日），頁2。

²⁷ 同時期的凌冰在《兒童學概論》一書裡也採用了相似的修辭策略：「現在研究新教育的，都知道教育應拿兒童做主體；都知道成人應該愛惜，保護他們；應該給他們在社會上有和成人享受同等待遇的機會；因為他們都是社會上未來的主幹。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不過是近十幾年內的事……。」凌冰：《兒童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頁8-9。

翼人士爲不加干預地向年幼的小讀者提供包藏封建自然與社會觀流毒的讀物感到擔憂。周作人所推崇的兒童發展中所必須的「無用之用」，也被不可避免地解讀爲政治化修辭立場之一種。這些爭論，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持續升溫。正如在商務印書館的龍頭期刊《東方雜誌》任職的碧雲所抱怨的：

……在目前選擇兒童讀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現在坊間已出版的兒童讀物，十之八九都是些神奇鬼怪王子公主之陳腐童話，花月貓狗之無聊詩歌，以及含有迷信意味，或封建意識色彩極濃重的東西，如「從前有一個王子，他有三個兒子……」、「一個人被妖魔迷住了。妖魔變成了一個極美的人和他結婚……」等等，至於兒童所需要的，如以新的技巧所寫作的童話、小說、詩歌、故事，內容正和上面相反的暴露著舊式童話中美麗的王國與王子的醜態與殘暴，和那些虛偽與迷信一類適合兒童教育原則的，幾乎是找不出來，在兒童教育方面說，這是一個怎樣大的嚴重問題！²⁸

周作人則說出不同的話。他推崇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的童話集。朗格是蘇格蘭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和古典學者，並編纂了十二部極受歡迎的童話集。這十二部童話集由世界各地的童話彙編而成，出版於1889到1910年間。由於它們的名字叫《藍色童話》、《淡紫色童話》等，並配上了鮮豔的封面和彩圖，所以被稱爲「彩色童話集」。²⁹在《紫色童話》（1901）的序言中，朗格闡述了童話故事的來源問題：

就像彩色童話集中的其他故事一樣，這本紫色童話書中的故

²⁸ 碧雲：〈兒童讀物問題之商榷〉，《東方雜誌》第32卷第13期（1935），頁297。

²⁹ 參見 Eleanor De Selms Langstaff, *Andrew Lang*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8).

事，都是從那些受歡迎的不同語言的傳統故事裡翻譯而來。這些故事跟人類發明的任何事物一樣年長。它們是從我們的祖先承襲而來，曾由赤身裸體的女野人，念給赤身裸體的野人孩子聽。我們的祖先真地相信，如果野獸、樹木、石頭願意的話，它們就可以開口發言，在行為舉止上也有善與不善之分。……隨著人們變得越來越文明，那些受人稱頌的國王和王后，王子和公主，通常成爲了故事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王公貴族和其他有教養的人，慢慢就忘記了那些古老故事的原本。但是居住在鄉野的人們沒有忘記，並把原樣的故事傳了下來……從一代到另一代。然後，讀過書的人收集這些鄉下人的故事，並把它們，這些我們已經翻譯了的故事印出來，來逗孩子們開心。孩子們的品味，仍與上千年前，他們赤身裸體的祖先十分相似，於是比起歷史、詩歌、地理或算術，他們似乎更喜愛童話，就像成人喜歡小說勝過其他的一切。³⁰

朗格的民族誌般的話語風格，是建立在潛藏的雙重二元論之上：兒童期對成人的關係，如同人類原始文明對現代西方文明的「他者」關係；兒童的發展，最後需要發展成爲具備現代文明的歐洲化的自我，如同原始文明的發展道路需要追隨西方現代文明的標竿。這種雙重二元論結構，也內置於周作人的發展式兒童文學觀和兒童心理學主張裡。就像洪長泰（Chang-tai Hung）指出的，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帶有明顯的朗格式進化主義烙印。³¹周作人說，兒童文學的出現，「只要看原始社會的文學的情形，便可以明白」：

照進化說講來，人類的個體發生原來和系統發生的程式相同：
胚胎時代經過生物進化的歷程，兒童時代又經過文明發達的歷

³⁰ Andrew Lang, ed., *The Violet Fairy Book* (London: Longmans, 1901), vii-viii.

³¹ Chang-Tai Hung (洪長泰),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42-43.

程：所以兒童學（Paedologie）上的許多事項，可以借了人類學（Anthropologie）上的事項來作說明。文學的起源，本由於原人的對於自然的畏懼的好奇，憑了想像，構成一種感情思想，借了言語行動表現出來……兒童的精神生活本與原人相似，他的文學是兒歌童話，內容形式不但多與原人的文學相同，而且有許多還是原始社會的遺物，常含有野蠻或荒唐的思想。³²

周作人固然也說，童年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應具有自身的價值。然而，由於其學說建立在歐美現代人和野蠻人的二元對立，成年人與兒童之間二元對立的雙重二元對立之上，所以最終的價值主體，是將歐美文明和成年人合二為一的歐美成年人主體。誠如他所言，童年那不可或缺的玩耍，指向的是文明開化的終極目標——如果真是這樣無功利，那他為何還要對「野蠻」、「荒唐」這樣的字眼津津樂道？周作人假設人類的個體發生發展與群體發生發展的程式相同，這思路是出自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胚胎學領域的著作。海克爾的在個體發生和系統發生之間具有不可避免的同構性的觀點，非常愜意地融入了十九世紀關於劃分種族優劣的「科學」之中。³³ 比如，海克爾主張種族差異正如個體差異那樣，能帶來進化的「不同程度的最適合狀態」。³⁴ 所以「地中海的物種，以及其內部的印度一日爾曼種」能夠憑藉其「更高程度的進化」而顯示出其「種族的優越性」——這也由他們「散佈全球的統治之網」再次確證。³⁵ 看得出，周作人的思維原型難脫歐美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帝國主義話語窠臼，其理論更是把作為個體的兒童的自身發展，與國家歷史發展的話語綁

³²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頁3。

³³ 對海克爾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嚴厲批評，參見 Stephen Jay Gould, *Ever Since Darwin* (New York: Norton, 1979). 就海克爾對魯迅的影響，參見 James Reeve Pusey (浦嘉璿), *Lu Xun and Evolu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³⁴ 上條注解裡浦嘉璿著作的第61頁也曾引用此句。

³⁵ James Reeve Pusey (浦嘉璿), *Lu Xun and Evolution*, 65.

架在一起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周作人當時以人道主義的姿態，堅持童年期應在作用上保持自主性並強調「中國特色」，卻無意間讓白人兒童及其文學作了中國兒童及其文學的範本，讓西方文明作了中國發展的範本。³⁶

周作人提倡將兒童從成人堆裡劃分出來，明確地作為一個不同的類別來對待。這其實就使得兒童成為被成人觀察、描述、指導和訓誡的客體了。周作人認為只有徹底把兒童與成人區別開來之後，人才有可能去領會童年發展的階段性特徵與需求。他勾勒出童年發展的四個階段，自嬰兒期（一至三歲），經過「幼兒期」的前期和後期（三至十歲），進入少年期（十至十五歲），再長成發展完全的青年。他還給出了每一階段所適合的讀物。周作人認為應當給嬰兒和處於「幼兒前期」的兒童閱讀童話、寓言故事和詩歌。這時，重點是聲調而不是意義，是想像而非說教。到了「幼兒後期」，兒童應該接觸一些更為複雜的敘事類內容，例如安兌爾然（Hans Christian Anderson，1805-1875，今譯安徒生）的作品，以及一些能滿足對於自然世界的好奇的故事。進入少年期的孩子應該閱讀戲劇、歷史傳說，還有更為重要的「寫實的故事」，但「這與現代的寫實小說不同，單指多含現實分子的故事，「如歐洲的魯濱孫（Robinson Crusoe）或《堂克訶台》（Don Quixote）而言。」³⁷周作人還稱讚了晚清的「社會小說」如《老殘遊記》，認為適合這一年齡閱讀。

周作人將兒童讀物的最後和最高階段設定為冒險故事，似乎只顧及了男性的童年成長問題。他挑選《魯濱遜漂流記》作為例子，更是體現了盧梭的影子。盧梭儘管對書面教育非常厭惡，卻提倡閱讀笛福的這部殖民探險經典之作，將堅毅、果敢的魯濱遜樹立為兒童成長效

³⁶ 這一擔憂，也見於凌冰1921年的論述中。作者展開了關於自然性質（由基因決定的遺傳）與後天培養（環境的因素）的討論。凌冰：《兒童學概論》，頁2-3。

³⁷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頁5-6。周作人還認為不應產生「不適當的英雄崇拜與愛國心」。為此，他建議應向兒童提供「各國的材料」。

仿的榜樣——魯濱遜白手起家並建立了一個海外居住地的故事，能提供給孩子們一個關於「文明」世界戰勝「野蠻」世界的信念，和關於如何創建現代文明生存方式的似真感受。³⁸ 周作人在借用盧梭的主張時，將文學現實主義所體現的成熟認知水準作為目的論上的童年認知發展的終結水準——意思是說，當一個人能有效地閱讀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足夠複雜的似真性敘事時，就意味著他在心智上已經臻於成熟了。這一提法，與兒童心理學家黃翼對童年發展的概括具有根本上的共通。無獨有偶，這也與各民族本土小說文學在歐洲、中國晚清和民初的發展階段性不謀而合。³⁹

四、兒童、民俗研究，和新式的國家本土話語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上述兩種發展歷程所被表述出來的同構性，是有意提出，絕非偶然。這樣一種為各年齡段的兒童而作，振奮人心且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文學發展套餐，有助於挑戰傳統式教學方法，阻撓儒家正統思想的傳播，因而顯然是五四時期國家建設進程的關鍵（儘管時常被忽視）一環。同時，由兒童所參與創作的，通常以兒歌和民謠為形式的文學，作為在概念和語用表達上的一種新的國家本土語料，在整個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變得與「兒童的文學」同樣重要。同時，周作人的著作，最為貼切地象徵了這一在拯救孩子和反過來被他們解救之間，在解救孩子和把他們當作炮灰而綁在新文學的戰車之間的雙重遊走。眾所周知，周作人是中國民俗學研究興起之際的關鍵人物。他對這一領域的興趣，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之初在他留學日本之時。那時他接觸到的，不只是安德魯·朗格的作品，還有傑出的

³⁸ 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4), 50.

³⁹ Kirk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日本民族主義者、民俗學家柳田國男（1875-1962）的著作。⁴⁰ 在受到柳田國男民間材料收集方法的啟發後，辛亥革命之後回國的周作人開始在浙江家鄉四處收集兒歌。到1920年，周作人就成為了北京大學新成立的歌謠研究會的主任，他還是頗具影響力的《歌謠週刊》的編輯和活躍作者。

該話語領域的來源成分極其豐富。它們是由（朗格和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民族學學者的）文化達爾文主義元素、日本對德國民族主義思想（來自赫德〔Herder〕和費希特〔Fichte〕，通過柳田國男）的借鑑，還有從晚明李贄和馮夢龍等獨特思想家的白話文書寫等拼湊而成。周作人將白話、歌謠和新文學對「真實」的追求，隱喻為從晚明一脈相承的「童心」，（正好與陳舊的儒家正統擺出相悖的姿態），並以此為他自己的文體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來定位。⁴¹ 這樣一來，似乎就能通過拼湊出來的文學話語，打開一條聆聽民眾的真實心聲的通路，從而避開僵滯不前、縮手縮腳的菁英文學的侵染。

對周作人的同行胡適而言，威達雷（Baron Guido Amedeo Vitale，1872-1918，義大利民俗學家，曾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編纂了兩本中國兒歌和兒童故事集）的作品和思想更具有典範意義。⁴² 早在1896年，威達雷就投入到對一本名為《北京兒歌》的集子的工作中，其題目預示了日後周作人和胡適的此項事業：

由於它們出自不識字的人之手，由於這些作者對書面語言毫無概念，這些作品展現了這樣一套韻律——它們與許多歐洲國家

⁴⁰ Chang-Tai Hung（洪長泰），*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44-45.

⁴¹ 周作人說李贄與馮夢龍都對他很有影響力。參見周作人：〈關於近代的散文〉，收於陳信元編：《周作人代表作》（臺北：蘭亭書店，1983年），頁201-205。

⁴² Chang-Tai Hung（洪長泰），*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59-60. 亦參見 Guido Amedeo Vitale（威達雷），*Pekinese Rhymes* (Peking: Pei-t'ang Press, 1896)；《北京兒歌》（北京：天主教北堂，1896年），及其 *Chinese Merry Tales* (Peking: Pei-t'ang Press, 1901).

的韻律相近，幾乎與義大利詩歌的規則完全吻合。在這些音韻以及人們的真實情感的基礎之上，或許，一種新的國家詩歌得以萌芽。⁴³

換句話說，兒童和無知無識者的創造力得到了發現和認可，並被用來確認「普遍適用的」西方文學發展模式之有效性。這為現代白話文及其新的文學史觀浮出水面提供了鋪墊。

五、「消費」兒童

對於現代白話文從兒童修辭上獲利的情形，只從話語層面上來進行理解是不夠的。這是由於五四「啟蒙的生意」，對於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些營造各色話語的主要出版商，確實是利益攸關的現實「生意」。李歐梵曾經說過這一點。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新知識（既有文學方面的，也有科學方面的）的引入，往往與兒童的「生意」有關。商務印書館的發家史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該企業自清季到民國在商業上毋庸置疑的支配地位，是以它對國家教科書市場的壟斷為基礎的。這一局面是在1904年，隨著《最新國文教科書》的出版而確立的。王雲五（1921年至1937年任商務印書館主編和經理）說，小學入學人數的穩步增長，帶來了由政府准許的教科書市場的前景一片大好。⁴⁴1912年中華書局的成立，這就是為了從商務印書館手中分得一杯羹——中華書局後來佔有了全國教科書市場的三分之一。

就連那些以嚴肅小說和現代文學的出版為核心業務的出版商，也十分依賴少年兒童書籍的出版利潤。北新書局、開明書店和現代書局都出版了大量的兒童文學和教科書。北新書局和現代書局還各自發行

⁴³ Vitale, *Pekinese Rhymes*, ix-x.

⁴⁴ Christopher Alexander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Mechanized Printing, Modern Publishing,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City, 1876-193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6), 304.

了面向青少年市場的刊物《小學生》和《現代兒童》，與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和中華書局的《小朋友》分庭抗禮——後兩者的雙周發行量都超過了兩萬份。⁴⁵

愛國話語也成為教育市場的一個「賣點」。舉個例子，1934年1月，一期《現代》上有一篇為《現代兒童》所作的顯眼廣告，展示加入《現代兒童》會員資格全年僅需2元，並宣傳《現代兒童》雜誌的亮點如下：

《現代兒童》的精神是最年青的，《現代兒童》要使全國的小朋友成為小軍人小工人小農人。所以我們這裡沒有花呀月呀阿貓阿狗的無聊詩歌，沒有國王公主王子的腐化童話。我們所登的文字圖畫是——社會：有系統的時事談話社會知識；自然：科學的社會化趣味化；文藝：詩歌童話的社會化科學化。⁴⁶

兒童市場的興起，離不開社會思潮、專家知識等的合力。周作人「對兒童的發現」的呼求，遊移在認知發展、童年本位和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之間，成為民國時期兒童話語知識譜系的黏合劑。周作人依據小讀者年齡而劃分閱讀內容的構想，成為了商務印書館等的行銷原則。1937年在《兒童世界》上的一個廣告系列就是個典型，兜售的讀物系列在範圍和卷數上令人咋舌。⁴⁷有一套「幼兒文庫」由350卷組成，側重於圖片和「以兒童生活為中心」。還有一套由王雲五本人參編的「小學生文庫」多達500卷，涵蓋了46種知識領域。「小學生年份補充讀本」更是由600卷組成，涵蓋體育、社會、自然、勞動和音樂等。此外還有26卷的「兒童史地叢書」，24卷的「兒童文學叢書」，和「世界兒童文學叢書」，後者借鑑朗格的《彩色童話集》的

⁴⁵ 陳伯吹：〈牧歌聲聲一線牽〉，收於《我與開明，1926-1985》（上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頁13-15。參見市薪：〈談談兒童雜誌〉，《開明中學生》第1卷第8期（1930年），頁443-445。

⁴⁶ 《現代》第4卷第3期（1934年1月）。

⁴⁷ 《兒童世界》第6卷第38期（1937年3月）。

方式，向中國小讀者呈現了巴西童話故事集、紅印第安人傳說、《瑞士家庭魯濱遜》（*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另譯《海角樂園》），和奧斯卡·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等譯本。「少年叢書」則向更大的孩子提供現實主義故事和歷史知識，包括了解中外名人如陶淵明、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拿破崙（Napoléone Buonaparte，1769-1821）、班昭 and 達爾文等。⁴⁸ 這一總共超過1,500卷的浩大工程，完成於中日戰爭爆發前夕，展現了中國的兒童讀物出版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頂峰。

六、執著的歷史之鏡

以兒童為名目的消費，除了書籍，還包括其他各種商品形式，比如說玩具。早在1918年，商務印書館就已經製造並銷售100餘種玩具。其廣告曾刊登在暢銷的綜合類雜誌《東方雜誌》上，對資產階級家庭的教育抱負予以調教，是五四以來兒童發展話語的市民階級版。與黃翼的兒童發展模式一樣，該廣告的出發點是明確宣稱要與西方接軌。該廣告煞費苦心地細數了其「建築類」、「交通類」、「軍事類」、「英文類」、「數學類」、「體操遊戲類」和「手工類」的玩具分類清單，提示購買它們的重要意義在於贏得時代的潮流，擁有充滿力量、健康、科學知識和啟蒙的烏托邦式未來：

中西年節贈給兒童最為有益。

本館自製各種玩具，均揣兒童之心理，本教育之原則，精心製造，顏色鮮明，物料堅固，趣味濃深，且無不含有相淺之學理，兒童玩弄日久，足以啟發心思，強健身體，中西風俗，每值良辰佳節，必購備玩物給與兒童。今若以此等玩具，購給兒

⁴⁸ 《兒童世界》第3卷第38期（1937年2月）。

童，自必備受歡迎，大有裨益。⁴⁹

魯迅在一篇題為〈玩具〉的雜文裡，就表達了由於中國玩具之落後而引發的焦慮。這篇文章以「宓子章」的筆名，在1934年兒童年之際刊登於上海《申報》。⁵⁰ 裡面說道：

馬路旁邊的洋貨店裡掛著零星小物件，紙上標明，是從法國運來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見一樣的貨色，只是價錢更便宜。在擔子上，在小攤上，都賣著漸吹漸大的橡皮泡，上面打著一個印子道：「完全國貨」，可見是中國自己製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著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樣的印子，那卻應該是他們自己製造的。⁵¹

比起本土產品的缺乏，更為令人扼腕的，則是想像的匱乏。通過與外國孩子的對比，這種不足是難堪的：

公園裡面，外國孩子聚沙成爲圓堆，橫插上兩條短樹幹，這明明是在創造鐵甲炮車了，而中國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臉，躲在大人的背後，羞怯的，驚異的看著，身上穿著一件斯文之極的長衫。⁵²

我不禁想問：這究竟是誰在看誰？魯迅的目光，明顯地是停留在中國兒童的身上，甚至當文中的中國兒童企圖逃避來自洋人的「鄙夷或悲憫」的目光時，也是如此。⁵³ 安·阿納格諾斯特（Ann Anagnost）在論及魯迅於1933年9月爲《申報月刊》撰寫的〈上海的兒童〉一文時說，這類作品引發了「對注視兒童這一舉動的全神貫注。」在那

⁴⁹ 《東方雜誌》第15卷第12期（1918年12月）。

⁵⁰ 宓子章（魯迅）：〈玩具〉，《申報》，1934年6月14日，收於《魯迅全集》，第5冊，頁508-509。

⁵¹ 宓子章（魯迅）：〈玩具〉。

⁵² 宓子章（魯迅）：〈玩具〉。

⁵³ 宓子章（魯迅）：〈玩具〉。

注視之中，被凝視的兒童承載了社會想像，變成了「一間貯藏了渴望——即盼望中國從半殖民地狀態超越而出的渴望——的替代品的儲物室。」⁵⁴



圖三：「教育玩具」。摘自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第15卷第12期，1918年12月。

其症候，體現爲一種視覺「戀物癖」。從商務印書館1918年刊登的那則玩具廣告就能看出（見圖三）。它邀請潛在的購買者仔細打量一個正在玩耍的胖嘟嘟小男孩。他穿著肚兜，被框在一個三角形的構圖裡頭，背景是一片黑色。這樣一種視覺修辭，將孩子從背景之中突顯了出來。一堆五花八門的玩具圍繞著他——有一座尖頂房子，一輛汽車，一隻狗，還有一個看著像某一種鳴禽的玩具。簡言之，廣告

⁵⁴ 魯迅：〈上海的兒童〉，收於《魯迅全集》，卷4，頁561-562。亦參見 Anagnost, “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204。

所體現的，是一個與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家庭生活方式看齊的視覺之夢，是絕大多數中國市民階層即便在像上海這樣位於都市的通商口岸或是在像杭州這樣繁榮的外省城市，都可望而不可及的願景。擺設於其間的小男孩，是一個由成人世界創造，供成人凝視、遐想的未來主人翁。

由大人所想像出來的未來主人翁，成為了廣告畫中被凝視的對象。本章開頭說，只有將畫中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歷史性接榫起來時，內在的張力才會浮現而出。在這一點上，成年人的廣告圖畫與黃翼收集的兒童圖畫並無二致。文本在當時一廂情願地宣稱了什麼，若把圖文並置起來並與現實世界的歷史性接榫，就能分析出半殖民地時空所特有的時代症候，解析中國在兩次大戰間隙對兒童的烏托邦式發現：渴望未來的中國孩子能獲得符合資產階級「普遍性」的自我，渴望一套符合「科學」和「進化」理念的教育發展機制，渴望與此「科學」、「進化」理念相配套的，由簡單向複雜、由低級向高級循序發展的現實主義表現範式，最終能夠構築一個符合「科學」、「進化」理念的，由高素質未來主人翁所組成的發達的民族國家，一個具備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

歷史的實際進程永遠不會與任何一種烏托邦的構想如出一轍。只有在烏托邦願景裡，以往的歷史才會被一筆勾銷，並清白無瑕地書寫新的一頁。魯迅「救救孩子！」的振臂高呼是被鑲嵌在狂人「已早愈」並「赴某地候補矣」的敘事嵌套裡面的。同樣，民國時期企圖藉發現兒童而改寫歷史的烏托邦熱望，與這些圖片自身所暴露的半殖民地歷史性之間形成了張力——民國時期兒童生活的實況和成年人對「未來」主人翁的設計闡發，在當下均已成為歷史，隨處皆可觸摸，比如在文本裡，比如在圖畫中。它們與其說是一塊塊白板，毋寧說是一面面頑固的歷史之鏡，所映射出的，是歷史實際瞬間中所發生的症候。從被封存的文字和圖像紀錄中，它們仍在向我們訴說著當時的「此刻」。

徵引書目

- 《兒童世界》第3卷第38期，1937年2月。
- 《兒童世界》第3卷第38期，1937年3月。
- 《東方雜誌》第15卷第12期，1918年12月。
- 《現代》第4卷第3期，1934年1月。
- 市 薪：〈談談兒童雜誌〉，《開明中學生》第1卷第8期，1930年。
- 沈兼士：〈兒童公育〉，《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1日。
-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1日。
- 周作人：〈關於近代的散文〉，《周作人代表作》，臺北：蘭亭書店，1983年。
- 凌 冰：《兒童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
- 陳伯吹：〈牧歌聲聲一線牽〉，收於《我與開明，1926-1985》，上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
- 黃 翼：《兒童繪畫之心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
- 楊 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碧 雲：〈兒童讀物問題之商榷〉，《東方雜誌》第32卷第13期，1935年。
- 蔣 風：《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北京：少年文學出版社，1961年。
- 魯 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Andrew Lang, ed. *The Violet Fairy Book*. London: Longmans, 1901.
- Ann Anagnost. "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Shuen-Fu Lin and Ernest P. Young, eds. *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Chang-tai Hung (洪長泰).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 Christopher Alexander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Mechanized Printing, Modern Publishing,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City, 1876-193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6.
- Eleanor De Selms Langstaff. *Andrew Lang*.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8.
- 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4.
- James Reeve Pusey (浦嘉璿).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Kirk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ydia Liu (劉禾). "The Female Body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Manchuria in Xiao Hong's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in Angela Zito and T.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Nicholas Orme (尼古拉斯·奧爾姆). *Medieval Children*.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 Ping-Chen Hsiung (熊秉真).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ey Chow (周蕾).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cyclopedi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Stephen Jay Gould. *Ever Since Darwin*. New York: Norton, 1979.
- Sully. *Studies of Childhoo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 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 Tani Barlow (白露),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William Lyell. *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